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

为呼应学界对史料多元化的追求和多民族语言文献、档案资料利用的重视，2015年9月11—13日，本刊编辑部与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了“国际满学青年学者论坛”，并从与会学者的论文中，选取了其中利用满文档案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的研究成果，组成“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栏目，旨在激励青年学人，倡导满文文献与档案研究，为推动清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观点的创新尽力。

——编者按

东洋文库藏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述评

哈斯巴根

[摘要] 东洋文库藏有一部分珍贵的清代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从格式上分类，该部分档案有佐领根源档、佐领承袭或佐领署理的奏折及家谱档、世爵世职承袭的奏折及家谱档、引见补授档，旧营房兵丁一年情况汇报档、循例请给纪录档、纪录折单、谢恩折、钱粮关系档、佐领遗孀生女上报档等类型。本文从档案的内容入手，从蒙古八旗的佐领人员构成、牛录及佐领的类型、世爵世职、法令的实效性，档案的语种等几个方面分析和肯定了该部分档案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蒙古八旗 东洋文库 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5）-04-0069-11

在东京的东洋文库保存有几千件与清代八旗有关的珍贵档案。前人对其做过几次目录。[①]其中，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档案的雍正和乾隆两朝部分，分别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得以公布，[②]后又有汉译本刊布。[③]相关档案的介绍和评价有细谷良夫、中见立夫、柳泽明等几位日本学者的

[收稿日期] 2015-05-04
[作者简介] 哈斯巴根（1972—），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hsbgn@126.com。

① Nicholas Poppe，et al. *Catalogue of the Manchu 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o*，The Toyo Bunko &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松村润 《东洋文库所藏满洲语文献》，《史丛》第27号，1981年 《东洋文库所藏镶红旗档光绪朝目录》，2006年 《满洲语档案目录（镶红旗档以外）》，东洋文库，据东洋文库工作人员介绍，该目录是2008—2009年间编写的。

② 《镶红旗档—雍正朝》，东洋文库，1972年 《镶红旗档—乾隆朝1》，东洋文库，1983年 《镶红旗档——乾隆朝2》，东洋文库，1993年。

③ 刘厚生译 《清雍正朝镶红旗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关嘉录译 《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文章。[1] 笔者这次接触到的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也是和以上档案属于同一类资料。但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分档案从未有人详细介绍过。同时，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如此一定数量的有关蒙古八旗的珍贵档案还没有公布过。在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八旗都统衙门档案并不完整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档案更显得格外重要。在此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初步的史料价值评价，以飨学人。

一、档案的概况

本文着重关注东洋文库所藏清代蒙古镶白旗都统衙门档案的特色和价值。文中所注档案号依据东洋文库所编《满洲语档案目录》中的编号。

1964 年，鲍培、冈田英弘等为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文献资料做目录时对满文档案也做过简单的目录。[2] 1998 年，后藤智子发表文章介绍东洋文库所藏武职及佐领家谱，更正了 1964 年目录的一些错讹之处，并指出了有关蒙古镶白旗的档案共有 137 件。[3] 然而，东洋文库的最新目录把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重新编号为 MA2 –23 –4、MA2 –23 –5，分别登记有 60 件和 96 件。MA 应该是英文 Manchu Archives（满文档案）两个单词的首字母。但是，笔者翻阅时发现 MA2 –23 –5 下共有 98 件，目录少做了 2 件。这样按照现有目录，总共有 158 条。实际上，不应该这么多，因为原封套已不见（可能已损坏），重新整理时装到新式的信封里，并拆散原本作为附件的家谱类档案和满汉合璧档案分别装入信封，单独编号登记，这样条目便增加了许多。其实原档应该是每一件补授佐领或世爵世职的奏折都附有一件家谱。因此，如果按照满洲镶红旗档整理的方法，也就有 90 多条了。另外，因为清代的封套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没有千字文的排序号可循。这也是该部分档案与镶红旗档的不同之处。

东洋文库在镶白旗档的每一件档案上记有整理号，并钤盖了文库的章，登录日期为：昭和十七年（1942）九月二十五日。我们知道，满洲镶红旗档是 1936 年 4 月从复旦大学陈清金教授处得到的。[4] 但是，满洲镶红旗档案上有无东洋文库的入库印章，一直没有人交代。因此，也很难确认这部分镶白旗档与满洲镶红旗档是否是同一批购置。

从目录看，最早一份档案的日期为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初四日，最后一份档案的日期为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初七日。虽然有一些档案的日期难以判断，但最早和最晚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登记的 158 条档案，上自雍正，下至光绪，各朝都有。在已经确认年代的档案里，同治年间的最少，只有 2 件，最多的是乾隆年间的，有 40 多件。可以推测，这部分东洋文库的档案在整个清代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中占据很小的比例。

此外，从档案使用的文字来看，明显有年月日的汉文档案是从光绪元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不管是奏折的正文还是家谱都用满文撰写。可见，虽然从清中期开始满文在八旗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但在公文中一直持续使用到清末。光绪元年的一份“为承袭二次分编世管佐领事”奏折及家谱（档案号分别为：4 –49、4 –50、4 –52、4 –52）都使用满汉合璧的

---

① 细谷良夫《关于〈镶红旗档——雍正朝〉——围绕雍正朝八旗史料》，《东洋学报》55 卷；中见立夫《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柳泽明《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满语研究》2012 年 1 期；后藤智子《关于东洋文库武职及佐领家谱》，《满族史研究通信》17，1998 年。

② *Catalogue of the Manchu 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o*，pp. 257 –258、260.

③ 后藤智子《关于东洋文库武职及佐领家谱》，《满族史研究通信》17，1998 年。

④ 中见立夫《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

形式。这样满汉合璧的档案还有光绪十四年的“为承袭恩骑尉事”（档案号分别为：5－67、5－68、5－69、5－70）和光绪二十四年的“为承袭云骑尉事”（档案号分别为：5－48、5－49、4－50、5－51）等档案。还有一些奏折或家谱也有满汉合璧的。但并不是每一件都这样，可以推测这种做法可能还没有法令依据，不是很规范的做法。此外，个别档案或个别处有使用蒙古文的情况。

东洋文库镶白旗档的格式，可以分为奏折和家谱两大类。奏折的纸张尺寸，每扣长约23.5－26.5厘米，宽12厘米，书写6行。而家谱根据内容，纸张长短不一。从档案的格式和内容来看，这部分东洋文库镶白旗档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A佐领根源档，B佐领承袭或佐领署理的奏折及家谱档，C世爵世职承袭的奏折及家谱档，D引见补授档，E旧营房兵丁一年情况汇报档，F循例请给纪录档，G纪录折单，H谢恩折，I钱粮关系档，J佐领遗孀生女上报档等。

A：佐领根源档。第一折正中间写有“nirui janggin ×××jalan halame bošoho nirui sekiyen”或“nirui janggin ×××bošoho teodenjehe nirui sekiyen”。[①] 正文开头是nirui janggin，结尾为gingguleme tuwabume wesimbuhe。这种档案有4－1、4－3、4－21三份。以前有人介绍时称为“nirui sekiyen i cese佐领根源册”或“nirui sekiyen booi durugan i cese牛录根源家谱册子”。[②] 但是，东洋文库镶白旗档没有一件上写有“cese册子”字样，所以应该称之为佐领根源档。这三份档案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在职的佐领有无ubu（分）的问题，因为从康熙朝开始有无分与佐领承袭是密切相关的。[③]

该类档案没有明确写明其形成的时间。但从世系来看，《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中都提到了档案中出现的baši（八十）、batu（巴图）和haišeo（海寿）等人名，[④] 再加上乾隆三年颁布的清理牛录根源的上谕，[⑤] 可以推测该档形成的时间应该是雍正末至乾隆初年。这两个以八十和巴图为佐领的牛录分别在乾隆三十年和五十四年改定为公中佐领。[⑥] 4－4档应该是4－3档的附件即家谱。

B：佐领承袭或佐领署理的奏折及家谱档。这类档与C类档在东洋文库保存的镶白旗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从其文书格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B-a：第一折中间只有满文wesimburengge或汉文“奏”一个字，从第二折开始正文开头为kubuhe šanggiyan（或šanyan）i monggo gūsai，结尾处则书写日期及上奏人的官职和名字。这种格式的文书在整个这类档案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另外附有绿头签，[⑦] 写明承袭佐领的性质，以及拟正、拟陪等人的名字、年龄、骑射与前佐领的关系等信息。档案一般还附有所奉之旨，表示同意某某承袭或“知道了”字样。因为雍正七年副都统徐仁奏称，‘嗣后将八旗奏折及覆奏之旨，俱贴于一处，于合缝之处，钤盖旗印封固。”[⑧] 这得到雍正帝的认可并执行。因镶白旗档所属奏折全是乾隆以后的，所以谕旨都粘贴在文末的日期后面。现在看到的一些文书已经没有谕旨，这可能是有一些粘贴的纸张脱落或散失了。

---

① 相关档案的研究，参见承志《关于八旗牛录根源和牛录分类》，《东洋史研究》65－1，2006年。

② 承志《关于八旗牛录根源和牛录分类》，《东洋史研究》65－1，2006年。

③《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九日。

④《八旗通志初集》卷12《旗分志十二》。

⑤《清会典则例》卷175《八旗都统·授官》。

⑥《钦定八旗通志》卷20《旗分志二十》。

⑦ 细谷良夫（《关于〈镶红旗档——雍正朝〉——围绕雍正朝八旗史料》，《东洋学报》55－1，1971年）称为“绿头牌”，而柳泽明（《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称为“绿头牌副本”。笔者根据的是《中枢政考》（道光），卷6，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二册，第168页。

⑧《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二），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630－631页。

一般每一件“奏”都附有家谱。家谱是根据内容写在大小不一的一张纸上，并折叠成与奏折差不多的形式。这可能是考虑到装封套的方便吧。在文书的第一折的上下各贴一小张黄纸，写明牛录的性质、来源和相关法令内容等，这些可以叫作“签注”。另外，用黑色书写已经死去人的名字和相关人的年龄、职务等信息，用红色书写在世人的名字。还有，在拟正、拟陪人名上画有圆圈，或在人名后面贴小黄纸，写明其拟正、拟陪。在以往佐领的人名前面粘贴长方形的小黄纸，又在其名下粘贴小块圆形黄纸，标出承袭的次数。或在以往的佐领人名下贴有长方形的黄、红、蓝等各种颜色的小方块纸，以分别标注袭次，并在其人名下又在红色方框内写明承管的是原立佐领还是分编佐领等。

B-b：署理佐领事宜。这类档案有4－7、4－40、4－42等。第一折中间写有wesimburengge，右上角在红纸上写有“××请旨可否署理”等字样。正文以kubuhe šanyan i monggo gūsai开头，事由写的都是hese be baire jalin。谕旨也与B-a类一样，粘贴在日期后面。文档的结尾处写有上奏人的官职和名字。以上三份档的年代分别是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4－40、4－42还附有家谱，交代了相关世系情况。

C：世爵世职承袭的奏折及家谱档。在东洋文库做的目录中，MA2－23－5开头的档案绝大部分是这类档案。此类档案在文书格式上基本上和B-a类相同。第一折中间位置写有满文wesimburengge或汉文“奏”，从第二折开始正文开头为kubuhe šanggiyan（或šanyan） i monggo gūsai，结尾处则书写日期及上奏人的官职和姓名。谕旨和绿头签的形式也和B-a类档案一致。此外，一般是一个“奏”附有一件家谱，可以说构成一组档案。从现在发现的这类档案看，到光绪年间有“奏”和“家谱”的都有满汉合璧的情况（例如5－48、49、50；5－67、68、69、70等）。另外，该类档案的年代比较早，最早的一组档案是雍正五年的（5－14、5－15）。因为已经公布的镶红旗档中没有雍正四至九年的档案，所以这些档案显得尤为珍贵。年代最后的一组档案到光绪二十四年（5－47、5－48）。

D：引见补授档。其实前面说过的A、B、C三个类型的档案大体上也属于这一类型，但是D类档案和以上的档案有所不同：第一是数个世职及驻防佐领、骁骑校、防御等官缺的候补人名写在一起而一并奏请带领引见；第二是奏折没有详细交代官职的以往世袭情况；第三是没有附有家谱。这应该是简化手续的一种办法。柳泽明认为，这类档案是到了乾隆以后才大量出现的。① 我们看到的这类档案（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3、5－84）的年代是乾隆、同治、光绪各朝的。

该类档案一般是由奏折和绿头签组成的。奏折一开始就写有kubuhe šanyan i monggo gūsai。在发现的镶白旗档案里就有一份同治年间补授佐领的档案（5－83）在第一折中间写有wesimburengge一字，其他都没有这个字。一般，谕旨也保存下来了。绿头签有些是满汉合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奏折和绿头签分开写在一张纸上的，所以原本就是如此，还是后来粘贴在一起就不好判定了。

E：旧营房兵丁一年情况汇报档。旧营房（fe kūwaran）、新营房（ice kūwaran）是设立于北京城外的八旗官兵宿舍。② 旧营房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解决北京城内八旗兵丁宿舍不足而于北京城内八门之外所建的房屋。③ 有关营房所居兵丁的管理，雍正二年（1724）规定由各旗满

① 柳泽明《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113《营建志二》。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23《营建志一》。乾隆《会典则例》卷173《八旗都统三·田宅》。

蒙世职派出管辖官员。[①] 这类档案（5－85、5－86、5－87），在第一折中间写有“奏”或 wesimburengge 字样，接着或用满文 kubuhe šanyan i monggo gūsai fe kūwaran i baita be kadalare 或用汉文写道“管理镶白旗蒙古旧营房事务”。据档案，从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有规定，“旧营房有无事故，遵例每年十一月间具奏一次。”[②]（5－87）察看和奏报旧营房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十一月止一年内兵丁有无滋生事端等情形。我们现在看到的三件档案（5－85、5－86、5－87）的年代分别是乾隆三十五年、同治五年和光绪八年。其中后两件的内容很简短，只是呈报了这一年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事端，而乾隆三十五年的那份档案较长，内容是管理镶白旗蒙古旧营房事务、梅勒章京乌勒莫济为房屋修造等事宜请旨。

F：循例请给纪录档。《八旗则例》规定“旗下印房总办俸饷档房及各参领处汇办事件于一年内各项依限全完，并无逾限遗漏者，岁底详查汇奏，将承办参领、章京等各给纪录一次。”“佐领等官承办本佐领下事件，于三年内各项依限全完，并无逾限遗漏者，三年查核一次汇总奏闻，佐领、骁骑校、领催各给纪录一次。”[③] 由此产生的档案（5－88、5－89）满汉合璧，开头写有“奏”或 wesimburengge 字样。末尾处有年月日和批红。

G：纪录折单。这类档案其实都应附于 F 类档案中。5－92 号档是 5－88 号档的附件。F 类档案里说的也很清楚，附有“另缮清单”。在此所说“另缮清单”就是“纪录折单”。这些纪录折单（5－92、5－93、5－94、5－95、5－96）每一个都分为“emu aniya jalukangge 一年满”和“ilan aniya jalukangge 三年满”两部分，分别记录可以给与纪录之官员职务和姓名。该类档都与一个叫“常升”的印务参领有关。常升在同治六年的 5－83 号档中以副参领的身份也出现过。所以可推测，这些档案的形成时间应该是同治年以后。

H：谢恩折。这类档就有一件（5－90），是在三张纸上分别写有满、汉奏折和清单的档案。档案的开头有“奏”、wesimburengge 字样，内容是“为叩谢天恩事”，缘由是这位大臣七十岁生辰时皇太后赏赐他一些礼物。皇太后即是慈禧太后，这位大臣原来是黑龙江地方的一个骑都尉，后升为乾清门三等侍卫，赏入京旗正白旗满洲。其后，荐授都统，排为御前侍卫，蒙赏给头品顶戴，复荷赏穿黄马褂。汉奏折只有“臣芬”字样，查证《实录》，这位大臣名叫芬车，他任职镶白旗都统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以后的事情。[④] 由此推断，其七十岁生辰也是在此之后。

I：钱粮关系档。这件（5－91）满汉合璧的档案内容是镶白旗蒙古都统崇礼奏报该旗所领一年俸饷等数目。原档应该附有清单，可能后来丢失了，没有流传下来。

J：佐领遗孀生女上报档。该档案（5－82）的内容是，因已故佐领恩印的妻子常氏孕生一女，而族长呈报，该佐领又饬“该孀妇另行出结办理过继外，相应出具图片呈报甲喇处”等语。清廷向来对八旗户口的管理很严厉，兵丁及其家属的生死等事都须上报登记。佐领中女孩的出生可能与选秀女制度有关。从中也可以窥见牛录内族长的职务情况。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东洋文库镶白旗档的性质和归属问题。为什么一开始就断定这部分档案是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呢？原因一是文书上多处盖有满汉两种文字的“kubuhe šanggiyan i monggo gūsai gūsa be kadalara amban i doron，镶白旗蒙古都统之印”；二是从内容来讲，这部分档

---

① 乾隆《会典则例》卷 175《八旗都统·授官》。《钦定八旗则例》（乾隆七年版）卷 1《职制》。柳泽明《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

② 《镶红旗档——乾隆朝》97，东洋文库，1983 年，第 121—122 页。

③ 《钦定八旗则例》（乾隆七年）卷 2《公式》。

④ 《清德宗实录》卷 470，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癸卯。

案都与镶白旗蒙古有关。八旗各旗建立衙门是从雍正元年开始的。① “镶白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衙门初设于东单牌楼新开路胡同。雍正四年奏准：将灯市口西口官房一所，共一百零一间作为三旗都统衙门。六年，又将汉军都统衙门移设于东四牌楼大街灯草胡同，官房一所，计三十七间。乾隆十八年，将蒙古都统衙门移设于东安门外干雨胡同，官房一所，五十间。”② 乾隆初还有规定 “八旗具奏事件奉谕旨后，将奏折及所奉谕旨粘连一处，合缝处钤印收贮。”③ 这部分东洋文库镶白旗档无疑是在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副录档。④

二、档案的内容与价值

以上分 10 种类型介绍了东洋文库镶白旗档的基本情况。以下从几个方面考察该档案内容和简单地评价这部分档案的主要史料价值。

（一）这部分档案的最大价值在于详细地记录了蒙古镶白旗若干牛录的人员构成情况。那些被称为牛录根源的档，不仅有牛录的初创情况、佐领的承袭，还记述了该牛录内各个家族（mukūn）的原住地和姓氏等信息。例如，4－1 号档记载了镶白旗蒙古都统左参领所属第二牛录的情况。崇德七年（1642）多罗特部贝子绰克图从锦州率领一百三名人来附，编立牛录，由安他哈管理。其后，陆续管牛录者有：满韬、那木僧格谛、关保、八十等。这些牛录根源的档案所记佐领的承袭情况与《初集》记载的内容是一样的。⑤ 虽然牛录当初的首领分别出身于多罗特、巴林、札鲁特等部，但是牛录内部人员是由各地方的多个氏族构成的。从 4－1 号档来看，牛录构成的人员有：毛祁塔特地方人，巴鲁特氏；老哈泰地方人，莽努特氏；喀喇沁地方人，莎格杜尔氏；察哈尔地方人，斋拉尔（札赉尔?）氏；科尔沁地方人，札鲁特氏，等等，以族为单位交代了该牛录 11 个家族的人员。这些内容在《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史料中是没有记载的，可见其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利用这些档案可以继续研究蒙古八旗牛录构成人员的地缘、亲属、领主属民等关系，探究牛录编成的原理。

（二）对蒙古八旗牛录和佐领的类型与形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有关牛录的类型分类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丰富的成果。⑥ 近年有学者根据牛录根源册、执照等原始档案和《钦定拣放佐领则例》等史料，探讨了清前期八旗满洲牛录种类的变化过程。承志认为，入关前的牛录分为内牛录和专管牛录。康熙时分为原管牛录、世承牛录、凑编牛录。到雍正时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分类为原管牛录（勋旧牛录 fujuri niru）、世承牛录（世管牛录 jalan halame bošoro niru）、凑编牛录（互管牛录 teodenjehe niru）、公中牛录（siden niru）等。⑦ 赵令志、细谷良夫通过研究后指出，清代佐领按其组成方式可分为私属、公中两大类，其中私属又有勋旧、优异世管、世管、互管等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 23《营建志一》。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 112《营建志一》。

③ 《钦定八旗则例》（乾隆七年）卷 2《公式》。

④ 相关研究参见细谷良夫 《关于〈镶红旗档——雍正朝〉——围绕雍正朝八旗史料》，《东洋学报》55－1，1971 年。

⑤ 《八旗通志初集》卷 12《旗分志十二》。

⑥ 主要有细谷良夫 《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的一端》，《东方学》第 36 辑；安部健夫 《八旗满洲牛录研究》，《清代史研究》，创文社，1971 年；阿南惟敬 《天聪九年专管牛录分定的新研究》，《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 年；傅克东、陈佳华 《清代前期的佐领》，《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郭成康 《清初牛录的类别》，《史学集刊》1985 年第 4 期，等等。

⑦ 承志 《关于八旗牛录根源和牛录分类》，《东洋史研究》65－1，2006 年。

诸名目。[①] 这些分类法的不同是因为分类的视角不同引起的。

东洋文库镶白旗档中，佐领承袭档中也出现了诸多牛录的分类名称，如 fugjin niru（勋旧牛录）、da niru（原立牛录）、jalan halame bošoro niru（世管佐领）、siden niru（公中佐领）、teodenjehe niru（互管佐领）、fusehe niru（分编牛录）、sirame fusehe niru（二次分编牛录）、tugtan fusehe niru（初始牛录）、fagcaha niru（分编牛录），等等。这些资料为蒙古八旗牛录和佐领的分类研究提供了诸多的事例。下一步的工作是在仔细阅读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蒙古佐领的形成过程及其变迁问题。

以往学界对蒙古八旗形成的研究，一个焦点是天聪九年（1635）设立蒙古八旗问题。当时，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 16932 名。其中，除了古鲁思辖布等三个札萨克旗之外，剩下的 7810 名壮丁与"旧蒙古"合编为蒙古八旗。[②] 赵琦首先研究喀喇沁壮丁编入蒙古八旗的情况，作了"蒙古八旗喀喇沁佐领表"，[③]后来乌云毕力格又补充了一些。但是，他们的依据都是《初集》，现在发现镶白旗档后，还有几个方面可以做补充。

1，从以喀喇沁壮丁为主所编佐领来看，还应有左参领所属第十一佐领和右参领所属第十佐领。据镶白旗档载"额斯库率领喀喇沁三十二人于太宗时来归，后因加入旗丁作为整佐领，以额斯库承管。"（4－26）据《初集》该牛录的额斯库来归时编立的是半个牛录，到顺治八年"始益以外牛录人为一整牛录"。[④] 右参领所属第十佐领[⑤]也是因为《初集》的记述不清，之前并不知道鄂齐里吴巴式是喀喇沁塔布囊（4－39）。

2，"旧蒙古"的问题。天聪九年编设蒙古八旗时，是在内外喀喇沁的基础上加"旧蒙古"而形成的。"旧蒙古"是指左右两翼蒙古营。郭成康研究后指出：天聪四年定制，满洲八旗每旗各设蒙古五牛录，这四十个蒙古牛录辖于左右两翼。[⑥] 镶白旗档里有"在盛京时每旗初编五个牛录 mugdeni forgon de emu gūsade fugjin sunja niru banjibure"（4－22）的字样，证明当时确实存在这个事实。这样，四十个牛录的情况也逐渐露出其本来面貌。从镶白旗档的记载看，其中还有札鲁特部台吉所率领来归者所编牛录（4－21）。

此外，天聪九年设立蒙古八旗以前已经以一部分喀喇沁人为主编立了牛录。例如天聪八年来归而编立牛录的拜浑岱。他是赫赫有名的喀喇沁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的长孙。[⑦] 因其父死的早，拜浑岱成为喀喇沁第二代的真正实力派人物。[⑧] 从镶白旗档中的家谱看，有一部分家族几代住在所谓的"nugtere ba 游牧处"（4－4、4－45、4－47），这应该算是"在外喀喇沁"的后代吧。据《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载，拜浑岱之弟希尔尼[⑨]之子阿拜死后，"因将其尸体置于称作野马图的地方。其后，此地称作阿拜诺颜之苏巴尔罕。"[⑩] 据《蒙古游牧记》，野马图汉语称为蟠羊

---

① 赵令志、细谷良夫《〈钦定拣放佐领则例〉及其价值》，《清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② 参见郭成康《清初蒙古八旗考释》（《民族研究》1985 年第 4 期），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58—168 页。

③ 赵琦《明末清初喀喇沁与蒙古八旗》，《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 12《旗分志十二》。

⑤ 东洋文库的目录误以为右参领第十二佐领。类似的错误还不少，不再一一指出。

⑥ 郭成康《清初蒙古八旗考释》。

⑦ 《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40—241 页）误以为长子。

⑧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第 32—33 页。

⑨ 汉译本《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 241 页）以为"萨赉"。

⑩ 《博尔济吉忒氏族谱》（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377—378 页。

山，在土默特左旗西南三十里、喀喇沁右旗南一百三十五里处。[①] 又据《口北三厅志》载:“(察哈尔)镶白旗在独石口北二百四十五里，总管驻布雅阿海苏默。”[②] 布雅阿海就是布颜阿海。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的季子马五大(号七庆朝库儿)的第二子白言台吉就是他。[③] 查阅明代文献，北元晚期喀喇沁部一直驻牧于宣府、独石口边外附近。这样一来就清楚了，从巴雅斯哈勒传到其孙子辈的阿拜、布颜阿海一代人依然驻牧在宣府、独石口以北边外之地。其实，到白浑岱的长孙拉斯喀布一代时也驻在宣府附近。[④] 镶白旗档案显示，后来这些喀喇沁的汗、台吉等贵族们虽然被编入蒙古八旗，但他们的游牧地还是在边外，直到清中期有时候有些后人还驻牧于此地。看来八旗推行的也是属人行政，也就是其属人不管居于何处都归属于在京的各八旗。

由此可以联想，《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所记镶白旗蒙古都统察哈尔参领所属佐领，乾隆初编《初集》时共有七个佐领，[⑤] 到嘉庆初再编《钦定八旗通志》时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佐领了。[⑥] 这些佐领分别驻在北京和口外游牧地方。因此，我们似乎不能断定镶白旗的察哈尔参领为误载。[⑦] 当初察哈尔归附清朝而分别编入八旗还不是完全清楚的事情，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3，天聪九年以后编立的牛录问题。镶白旗档提供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即崇德六年从明朝锦州来归的多罗特部的情况。在察哈尔万户中，阿拉克绰特部和多罗特部都属于其山阳鄂托克。我们之前只是知道，天聪二年皇太极亲征多罗特和阿拉克绰特二部的敖木伦之战，被清军杀害或俘虏的是其部分人员，[⑧] 并不知其余人员的结局。但是，现在看到镶白旗档后明白，多罗特的绰克图、诺木齐塔布囊、吴巴式等首领在敖木伦之战后投奔到明朝的锦州，到崇德六年，清军围攻锦州时再投诚过来，[⑨] 后又编立牛录等情况(4-1)。其实刚开始编牛录后他们归到蒙古正黄、镶蓝等旗，但经几次清朝旗籍的转换后，他们最终归到蒙古镶白旗。另外，还有一些滋生人丁而增编牛录的情况也清晰起来了。

(三) 对蒙古八旗内世职的获得和承袭情况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在东洋文库满文文献目录中，以编号 MA2-23-5 开头的档案内容绝大多数是有关世职承袭的。世职的起源是天命五年(1620)制定的武职。[⑩] 至乾隆元年七月总理事务王大臣遵旨议奏‘本朝定制:公侯伯之下未立子男之爵，别立五等世职，但未定汉文之称。今敬拟:精奇尼哈番汉文称子，阿思哈尼哈番汉文称男，阿达哈哈番汉文称轻车都尉，仍各分一等二等三等。拜他勒布勒哈番汉文称骑都尉，拖沙喇哈番汉文称云骑尉。从之。”[⑪] 清朝由此有了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为世爵和五等爵以下属世职的分水岭。[⑫] 而恩骑尉是乾隆十六年以后对阵亡的世职封赠者在原爵袭完后清廷恩赏立爵人子孙的世职。[⑬]

---

① 《蒙古游牧记》卷 3。罗密著，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 页。
② 《口北三厅志》卷 7《蕃卫志》。
③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第 64 页。
④ 李保文《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年，第 324—327 页。
⑤ 《八旗通志初集》卷 12《旗分志十二》。
⑥ 《钦定八旗通志》卷 20《旗分志二十》。
⑦ 达力扎布《清代八旗察哈尔考》，载《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327 页。
⑧ 《满文原档》第六册，第 239—241 页。
⑨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93、317 页《清太宗实录》卷 55，崇德六年三月壬寅、乙巳。
⑩ 松浦茂《天命年间的世职制度》，《东洋史研究》42-4，1984 年。
⑪ 《清高宗实录》卷 23，乾隆元年七月戊申。乾隆《会典则例》卷 171《八旗都统·值班》。
⑫ 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⑬ 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第 47 页。

但是，以往因史料阙如，对蒙古八旗世爵世职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初集》相关的列传和表中有镶白旗蒙古世职有关人员的传略，可以和现在发现的东洋文库镶白旗档相互比勘研究。在档案中出现过绰贝①、色楞车臣②、贾慕苏③、巴雅尔④等世职人员。其中，如贾慕苏家族的家谱中写道 "此官贾慕苏尔原系壮达，二次过北京征山东时，用云梯攻滨州，尔首先登进，遂克其城，故赐名巴图鲁，授为骑都尉，后加恩由骑都尉加一云骑尉。"（5－13）交代清楚了其世职的来源。可知这些世爵世职的获得大部分是与清前期和南明、农民军、准噶尔的战争中所立军功有关。另外一个事例，察哈尔来归的色楞车臣家族的骑都尉世职是 "此官尔原系色楞车臣绝嗣，将所立二等子爵蒙特恩减为骑都尉。"（5－38）有关恩骑尉世职，镶白旗档有记述："查济尔嘎朗之袭官敕书内载，阿彦尔原系护军校，因出师贵州转战四川攻敌阵殁，授为云骑尉，长子鄂勒济图承袭，再承袭一次。出缺时，胞弟霍雅尔图仍承袭云骑尉。出缺时，云骑尉袭次已完，照例不准承袭。恩骑尉，后因特旨念系阵殁所立之官。赏给恩骑尉与原立官阿彦之二世孙塔勒巴札布承袭。"（5－68）可见，上述规定确实有效地实行起来了。

（四）对法令实效性的认识。在每一个佐领承袭或世职承袭档（奏折和家谱）的前面第一折上基本都粘贴两张小黄纸，写有两类内容：一是该佐领或世职的来源；一是相关法令。这可能是上奏时给皇帝以提示的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一法令对照当时其他的法令，研究其实效性问题。清代有关八旗的法令主要有《清会典》系列（则例、事例）、《中枢政考》、《钦定八旗则例》、《宫中现行则例》、《六条例》、《钦定拣放佐领则例》、《钦定兵部处分则例》，等等。但是，这些法令并非一次性修好的，而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重修一次。例如，《中枢政考》有康熙朝本和乾隆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九年、五十年以及嘉庆八年、道光五年本，《钦定八旗则例》有乾隆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九年、五十年本等。⑤ 清代行政依例而行，其例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所以，研究清代八旗官制和法律制度，必须注意其法令的变迁以及其实效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镶白旗档提供了真实的事例。在此仅以引见制度为例说明。雍正十年（1732）规定："嗣后凡袭职旗员由外省来京，请随到随奏，不令久候多费。"⑥ 后因在外驻防世职承袭的拟正、拟陪等人从驻防地到北京之间往返，颇费周折。乾隆初明确规定，确认为世职拟正、拟陪"著咨取来京"，⑦ "其列名之分者，著该旗行文咨问，其请愿来京者，咨取来京，不愿者听。"⑧ 镶白旗档中也记载了有些人确实没有前来北京面见皇帝之事，只是把他们的名字列于绿头牌上。另外，有关引见日期，原定每年年终八旗袭职，左、右翼分为二日引见，嘉庆十八年（1813）奉旨改为四日办理，镶白、镶红为十二月十六日引见。⑨ 但是，我们看到的镶白旗的记录与以上的规定有出入。首先是世职拟承袭人的引见日期，嘉庆十八年除5－41档是七月份的外，其他基本都是十二月份的。另外，嘉庆十八年以后也不一定只是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天引见。由此看来，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五）从档案文书的语种、出现的人名及其变化可以窥见八旗蒙古人在满洲化、汉化过程中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1《名臣列传三十一》。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171《名臣列传三十一》。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216《勋臣传十六》。

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216《勋臣传十六》。

⑤ 参见《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下《附录：清代内府刻书编年目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

⑥ 《清世宗实录》卷117，雍正十年四月癸丑。

⑦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1134《八旗都统二十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81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281，乾隆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⑨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584《兵部四十三》，第282页。相关研究见《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第15页。

的一个侧面。如前所述，纵观这些档案形成的年代，一直到光绪元年以前，不管是佐领承袭档还是世职承袭档，基本都是用满文撰写的。到了光绪朝以后，满汉合璧的文书多了起来，甚至有奏折和家谱各有满汉合璧的。但并没有一组档案是单用汉文撰写的，相信这并不单纯是档案流传的问题，很可能与清廷一直坚持的倡行满文的政策有关吧。

另外，档案中出现的八旗蒙古人的名字也是很有趣的内容。从世系表看，一般刚开始立官或初期承袭者的姓名大多数是蒙古文的。例如，绰克图、噶尔图、阿彦、孟格等。再加上还有一些西藏渊源的人名，因为16世纪晚期开始蒙古掀起又一次的藏传佛教信奉热潮，所以有那木僧格谛、阿玉石、丹巴等名字。其后，有一些人取了满语名字，至清朝晚期取汉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例如，福寿、永寿、善福等。当然仔细观察这些汉名和内地人取的名字还是有一些差别。另外，虽然到了晚清，但有一些八旗蒙古人依然取蒙古名字，这应该与他们和游牧处的蒙古文化有联系的缘故吧。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档案还显示了清代八旗蒙古人的职业、兵丁、人口、养子、寿命、驻防等各种信息。

三、结语

据朝鲜《燕行录》载，清入关时在多尔衮的军士中蒙古人占多数。《昭显沈阳日记》甲申(1644)五月二十四日记"世子一时出来，军兵之数十余万云，而蒙古人居多焉。"① 当然，入关时清军中的蒙古人可以分为札萨克旗兵和八旗兵两大类。其中，八旗中的蒙古人由两部分人组成：已经编入满洲八旗的蒙古人和蒙古八旗的蒙古人。这两部分八旗中的蒙古人口数字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但是其大概人数应该达到5—10万则是有根据的。满洲八旗中的蒙古人的情况可以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中了解其梗概。但是，在整个八旗中占人数众多的蒙古八旗的情况一直没有多少资料流传下来。基本的资料是《初集》、《钦定八旗通志》和实录。而以前我们看到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只是几个人物或某些家族的世系谱等，整个八旗蒙古的生存状况如何？目前几乎没有档案资料公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笔者看到的东洋文库所藏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当然，另一方面，这部分镶白旗档的内容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已经公布的东洋文库所藏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档相比，镶白旗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其存在不小的差距。这部分档案只是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当中有关政治的部分档案。此外，蒙古八旗的经济、文化情况基本没有得到反映。就政治方面看，如把法律制度考虑进来，其内容丰富程度明显欠缺，因为这些档案是镶白旗都统衙门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记录佐领或世职的承袭，这就基本圈定了该部分档案的局限性。

(笔者于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作为外国人研究员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访学。期间承蒙该院柳泽明教授多方帮助，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赵志强研究员的审校，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主要参考文献

[1] Nicholas Poppe, et al. *Catalogue of the Manchu 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o*, The Bunko &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

① 《燕行录全集》第26册，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5页。

[2] 松村润 《东洋文库所藏满洲语文献》，《史丛》第 27 号，1981 年。
[3] 《东洋文库所藏镶红旗档光绪朝目录》，东洋文库，2006 年。
[4] 细谷良夫 《关于〈镶红旗档——雍正朝〉——围绕雍正朝八旗史料》，《东洋学报》55－1，1972 年。
[5] 柳泽明 《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满语研究》2012 年 1 期。
[6] 后藤智子 《关于东洋文库武职及佐领家谱》，《满族史研究通信》17，1998 年。
[7] 承志 《关于八旗牛录根源和牛录分类》，《东洋史研究》65－1，2006 年。
[8] 细谷良夫 《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的一端》，《东方学》第 36 辑。
[9] 安部健夫 《八旗满洲牛录研究》，《清代史研究》，创文社，1971 年。
[10] 阿南惟敬 《天聪九年专管牛录分定的新研究》，《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 年。
[11] 傅克东、陈佳华 《清代前期的佐领》，《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
[12] 郭成康 《清初牛录的类别》，《史学集刊》1985 年第 4 期。
[13] 赵令志、细谷良夫 《〈钦定拣放佐领则例〉及其价值》，《清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14] 郭成康 《清初蒙古八旗考释》，《民族研究》1985 年第 4 期。
[15] 赵琦 《明末清初喀喇沁与蒙古八旗》，《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6] 雷炳炎 《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7] 刘厚生译 《清雍正朝镶红旗档》，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
[18] 中见立夫 《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清代满汉关系国际会议，北京，2010。
[19] 乌云毕力格 《喀喇沁万户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0] 李保文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呼和浩特：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年。

Review of the Bordered White Banner Mongol Commander Yamen Archives in the Toyo Bunko

Khasbagan (Manchu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sbgn@126.com)

The Toyo Bunko owns some collections of the valuable Qing dynasty archives of the Bordered White Banner Mongol Commander's Yamen. The collections include the archives related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mpany captain, the Memorials of the company captain, genealogical trees, the Memorials regarding hereditary positions and their genealogies, records of appointments, annual reports on the soldiers' barracks, records of daily expenses, the lists of the records, Memorials of Gratitude, the records of land taxes, the archives of company captains' widows and children and other documents. From the content of these arch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Mongolian Banners, the types of Niru and company captains, their hereditary titl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crees, the languages used in the archive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of these documents.